

思想解放语境中的革命历史传记剧创作

叶志良

—

—

1976 年以后在中国大地上所发生一切，无不意味着建国以后一段漫长的岁月中人民深处禁锢时对思想解放的等待与企盼。用政治化的语言来描述，思想解放运动的发生以及语境的形成，是长期以来极左政治教条笼罩的必然结果。当时刚刚复出的邓小平即适时提出“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指出“只有解放思想，坚持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我们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才能顺利进行”^[①]。从 1970 年代末到 1980 年代初，中国在充满着尖锐斗争的社会背景中实现了思想解放、完成了历史的转折；也正是在这样的思想背景下，掀起了文艺领域的声势浩大的拨乱反正运动。对于戏剧这一具体的文艺样式来说，戏剧主题的择定与拓展，自然也适逢其时地适应着历史转折的要求。当代戏剧成为人们压抑已久的心灵解放的窗口：既是直面现实、反思历史、展望未来的透镜，又是鞭挞丑恶、呼唤人道、呐喊变革的号角。戏剧以自身丰富的拓展性主题，成为思想解放时期社会情绪的承载者，自然也是社会思想的传达者。

列宁曾经说过：“历史早已证明，伟大的革命斗争会造就伟大人物，使过去不可能发挥的天才发挥出来。”^[②]伟大的中国革命曾经造就了许多伟大的人物。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以来，在艰苦卓绝的斗争中涌现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和领袖人物，尤以自己的丰功伟绩和高尚品质，赢得了人民的尊敬。他们的革命精神和光辉形象，不仅影响着当代，而且还将垂范后人。但是，新中国建立后，中国共产党中央规定，为防止“个人崇拜”和反对“现代迷信”，并不赞成文艺作品描写仍然健在的革命领导人的形象。因此，长期以来，我国文艺包括戏剧创作基本上都不正面描写无产阶级革命家和领袖人物。这使得描写革命领袖题材的作品成为创作领域的一大空白，戏剧舞台上几乎没有出现过一部正面歌颂老一代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剧目。尽管 50 年代初期，剧作家李伯钊

曾在她的歌剧《长征》中试探性地刻画过毛泽东的形象，但场面短暂，台词也不多。据称，演员于是之曾经是 50 年代第一个毛泽东的扮演者，剧中的“这个毛泽东是个只有一句台词的毛泽东。只见他站在高处，大手一挥：‘同志们，前进！’”^③而这个短暂的经历，曾给演员带来诸多的后果。尤其在“文化大革命”期间，老一代无产阶级革命家形象的塑造，俨然成为不准涉猎的禁区。

这一“禁区”的突破是在粉碎“四人帮”之后的社会主义新时期——思想解放时期。

可以说，新时期文学的第一个浪头，便是在“揭批罪恶‘四人帮’，歌颂革命老一代”的声浪中展开的。特别是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的相继逝世，刘少奇、彭德怀、陈毅、贺龙等开国元勋在文革中被迫害致死的真相大白，于是，痛恨祸国殃民的“四人帮”、缅怀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便成为举国上下人民群众的普遍心态。在这样的背景下，一系列塑造无产阶级革命家光辉形象的革命传记剧便络绎不绝地出现在舞台上，全国戏剧舞台涌现出以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经历为表现对象的革命历史传记剧的创作热潮。

在这次革命历史传记剧的创作浪潮中，最早出现的是乔羽、郇子柏等的话剧《杨开慧》，随后又马上涌现出白桦的《曙光》、《今夜星光灿烂》、苏叔阳的《丹心谱》、邵冲飞等的《报童》、丁一三的《陈毅出山》、程士荣等的《西安事变》、史超、所云平的《东进！东进！》、赵寰等的《秋收霹雳》、王德英等的《彭大将军》、雪草等的《八一风暴》、马融的《转战陕北》、沙叶新的《陈毅市长》、车连滨等的《朱德将军》、尤小刚等的《江南一叶》、漠雁的《朋友》、吕西凡等的《向警予》、刘倩等的《平津战役》、所云平等的《决战淮海》、李伯钊等的《北上》、邵兴等的《回师北上》等。同时还出现了以民主革命为题材的历史剧，如宋平等的《孙中山》、李培健的《孙中山伦敦蒙难记》、耿可贵的《孙中山与宋庆龄》等。而赵寰的《马克思流亡伦敦》、沙叶新的《马克思秘史》等，将革命传记历史剧反映的地域，推进到国际无产阶级革命导师的阵营之中。

二

这些革命历史传记剧与以往历史剧的最大不同，就在于剧作从各个不同的角度、层面，塑造了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革命领袖的光辉形象，因此

也自然而然地被人称作“领袖人物剧”。从新民主主义革命到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每一个历史阶段，每一次重大的政治斗争和军事斗争，都闪现着革命导师们的积极的身影，它们从总体上构成了中国革命丰富多彩、英雄悲壮的历史画卷。如《杨开慧》，主要描写毛泽东的妻子杨开慧烈士的革命生涯，涉及到毛泽东初期革命时的形象；《秋收霹雳》通过大革命失败后，毛泽东领导的秋收起义，表现了中国共产党人前赴后继的革命精神；《陈毅出山》写陈毅深入南方游击队宣传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表现共产党人以民族利益为重，与国民党二次合作共同抗日的伟大胸襟；《东进！东进！》描写陈毅率领新四军东进苏北，建立根据地，开展敌后抗日斗争的英勇事迹；《北上》展现毛泽东亲自领导的震惊世界的长征；《平津战役》、《决战淮海》写老一辈革命家聂荣臻、刘伯承、陈毅、邓小平、罗荣桓、粟裕等，在解放战争的决战时刻，指挥人民解放军与国民党反动派的生死搏斗；《朋友》、《陈毅市长》写上海解放后，陈毅担任共产党首任市长主政上海的赫赫政绩。这些话剧在塑造无产阶级革命家形象方面，与其他文学样式相比，可以说走在整个文学创作的前列，没有一个文学体裁、包括长篇小说的创作，能够像它那样大胆地突进这个“禁区”。同时，通过对领袖人物的刻画，既让观众看到历史进程中领袖们的风采，又使当代观众感受革命领袖的人格力量和精神气度，尤其是领袖人物对当今社会的影响。正像沙叶新在谈到《陈毅市长》创作主旨时所说的：“尽管我写的是上海解放初期的一段历史，但我尽量要将这段历史写成鉴诫今天生活的镜子；尽管我写的是二三十年以前的往事，但我非常希望今天的观众能从中得到现实的启示。不论在什么情况下，我都不能为写历史而写历史。总之，不是为了发思古之幽情，而是为了寄深意于现实；不是单纯地为了缅怀陈毅同志过去的丰功伟绩，更为了陈毅同志的伟大精神化为今天的物质力量。”^[4]

在大批描写领袖人物的革命传记剧中，艺术成就取得较高的，应数刻画周恩来、陈毅、贺龙、彭德怀等的作品。

白桦的《曙光》是一部具有鲜明特点的剧作。这是新时期第一部歌颂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剧目，也是第一次以戏剧的形式将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贺龙同王明“左倾”机会主义进行斗争的悲壮历史搬上舞台。在这里，戏剧的几要素十分分明。时间：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地点：受“左倾”路线影响下的洪湖地区；人物：贺龙；事件：剧本描写的是从1931年春到

1935年春遵义会议确立全党以毛泽东革命路线为指导的时期内，贺龙领导军民在洪湖湘鄂西地区展开艰苦卓绝的斗争的历史。但作者把同国民党反动派的斗争作为副线，而把同党内“左倾”机会主义的斗争作为主线，通过惨痛的历史和血泪的教训，揭露和控诉了“左倾”路线的严重错误和给革命事业造成的巨大损失，让观众从土地革命时期的历史教训去思索并得出有关“文化大革命”的结论。在当时铺天盖地的“伤痕文学”潮流中，剧作并不一味展示“文化大革命”给人们留下的“精神伤痕”，而是对“文革”为何给人们留下“伤痕”作进一步的理性思考，它把“之所以发生文革”的思想根源，反思到中国共产党早期革命斗争中所存在的“左倾”路线，这个反思，使得《曙光》作为这个时期第一部思想反思性的作品，无论在文学史还是话剧史上，都占有自己独特的历史地位，彪炳史册。白桦的剧本创作文学性高于戏剧性，注重对剧作诗性的追求，难怪有人评价白桦的剧作是“剧中有诗”，或者说“他的剧本是一首用对话形式写成的长诗”。[\[⑤\]](#)

王德英、靳洪编剧的《彭大将军》，显然也是新时期以来塑造老一代无产阶级革命家形象的优秀剧作之一。这是我国第一部以彭德怀为主角的大型话剧。它描写朝鲜战争爆发后，毛泽东作出“抗美援朝”的决策，彭德怀担任志愿军司令员率军参战的史实。而戏剧只截取彭德怀在抗美援朝战争初期指挥的头两次战役的进程为主要事件，来刻画这一卓越统帅和真正战士的光辉形象。作者从丰富而复杂的生活和特定人物的个性出发，不但没有神化彭总，而且敢于写他的音容笑貌，写他的嬉笑怒骂，写他的“人情味”，写他的孩子气，写他的发虎威，甚至写他的缺点。剧作刻画了一个正直坦荡、不计个人安危，具有刚正不阿、坦率真诚的性格，有勇挑重担、严于律己的品德，有关心战士、赏罚分明的作风，既有金戈铁马式的豪气，又有无产阶级的柔情，以及知己知彼、能征善战的“彭大将军”的丰满形象，达到了历史真实与艺术真实的高度一致。

周恩来也是新时期剧作重点反映的对象。新时期最早出现周恩来形象的作品是《报童》，它通过反映抗战时期几个报童的故事，生动细腻地描写了周恩来的情趣横生的生活侧面，表现了老一辈革命家与人民群众的血肉关系和对年青一代的深切关怀。剧作巧妙地把儿童生活同重大的历史事件联系起来，既有儿童情趣，又刻画了革命领袖的光辉形象，是一部对儿童进行革命传统教

育的生动教材。苏叔阳的《丹心谱》中，虽然周恩来的形象没有直接出现，但通过电话形象，其性格上的“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精神特点仍然十分醒目。

《八一风暴》中，周恩来领导的“八一”南昌起义，以武装的革命反对武装的反革命，表现了周恩来的革命胆略和远见卓识。而程士荣等的《西安事变》，根据“西安事变”的历史事件，重点刻画了周恩来的形象。这一事变虽然由张学良、杨虎城发起，但剧作者运用历史唯物主义原理进行深入分析，认识到事变发生的根本因素是我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英明正确。因此全剧以我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为贯穿线索，敌我友三方围绕着这根线索来组织矛盾。而统一战线政策的具体实施者是由周恩来在第一线贯彻执行的，所以全剧以周恩来为驾驭事件的主角，把周恩来形象置于戏剧冲突的中心来正面描写，把他在西安事变中的伟大历史作用和功勋，他无畏的英雄气概和卓越的斗争才能，以及他的精神风貌，都饱满地描写出来。尤其是作品进行了一定程度的艺术虚构，让周恩来与蒋介石进行面对面的正面交锋，既反映了历史的本质，又使剧中的矛盾冲突得以集中凝聚，有利于周恩来形象的塑造，取得了更好的艺术效果，自然把周恩来的形象塑造推向高潮。

描写陈毅元帅也是新时期戏剧创作的热点。史超、所云平的《东进！东进！》、丁一三的《陈毅出山》、漠雁的《朋友》、沙叶新的《陈毅市长》等，从不同角度广泛地描绘了从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到新中国诞生以后的陈毅形象。尤其是《陈毅出山》和《陈毅市长》，更是描塑陈毅形象的代表作品。前者选取了主人公所经历的一个特殊历史年份——国内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极为复杂地交织在一起的1937年，在特殊的历史背景下塑造出陈毅所具有的典型性格。剧作既在广阔的历史背景下，揭示陈毅思想精神面貌的深度和广度，同时，依据生活的真实逻辑，把陈毅作为一个活生生的普通人来刻画，既表现他在与敌人周旋中，坚持原则，有理有节，沉着机智，运筹帷幄的大将风度，又细致入微地刻画了对人民群众的纯真感情，显现出“这一个”无产阶级革命家的特殊人格魅力。曹禺在观看该剧之后说，剧作“把陈毅同志写活了，它使我们看了之后永远地想念着陈毅同志，决心跟着他前进。”^[6]后者《陈毅市长》，选取陈毅出任上海市长所经历的十件事，采用“冰糖葫芦式”的戏剧结构，“着重选取那些陈毅同志所具有的而在今天现实生活中正在大力倡导或业已有所失去的思想品质来写”，^[7]突出地塑造了历史上人民好公仆的形

象，而且针对现实产生了较大的启示效果，为革命历史题材的创作如何具有现实意义，探索出一条有价值的路。

三

著名学者孟繁华指出：“1978 年代在 20 世纪后四分之一的历史叙事中，是一个被人们反复谈论的年代，它的重要性，首先是作为开启又一时代的标示，它有了伟大的象征意义并深植于一个民族心灵深处。谈论起它就意味着体验共同的解放、拥抱共同的复活节，它仿佛传达了这个民族共同的情感与幻想，共同的精神向往与内心需求，它是人民激情奔涌的新的源头，往日的心灵创痛因它的涤荡抚慰而休止并且康复，因此，这也是又一个‘结束或开始’的年代，又一段‘激情岁月’。”^[8]包括剧本创作在内的文学创作，作为这个时代的表意形式，最为有效和准确地表达了这一时段民族的精神形态和主流意识形态意图。它以传统的英雄情怀和启蒙话语参与了动员民众、决裂旧的意识形态和共同创造未来的意志。革命历史传记剧的问世，对于那个时代来讲，确是意味深长的。它不仅是对“禁区”的突破，填补一个时期以来文艺描写刻画领袖人物的空白，更重要的在于，革命传记剧的出现，是思想解放运动在文艺上的鲜明投影。

具体地说，革命传记剧的适时而出，体现出明显的意识形态的意图。粉碎“四人帮”，尤其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随着政治上的拨乱反正、思想上的大解放，中国社会完成了历史性的大转折。在这样的背景下，肃清文革流传下来的余毒，在批评中重新自振并建立民族自身的权威性和社会责任感，是这个阶段的的重要的阶段性任务。而揭批“四人帮”的罪行，总是与歌颂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联系在一起，揭批和歌颂成为那个时代的双重声音。从初期的“伤痕”式的描写，到后来“反思”型的解剖，无论是直接揭露文革给中国社会带来的动荡秩序，还是揭示文革极左思潮对中国思想界的影响，在革命领袖传记剧中，都与塑造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形象密切相连，它们本身就是思想解放运动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是通过文学方式的思想解放——心灵的、精神的解放。像《曙光》，就直言极左政治给中国革命带来的巨大损失，理性地评判了文革极左思潮在中国革命道路上的渊源关系，对历史的审视作了相当深入的反省。这些革命历史传记剧，在广阔的视野上，从更纵深的历史背景上思考极左政治发生和形成的历史、文化、人性的根源。当然，控诉“四人帮”

给人们造成的伤痕，后反思民族灾难的教训，都呈现出浓郁的政治色彩。因而，在某一领袖人物的塑造中，也更多地凸现了领袖的政治人格。

但不管这么说，这一时期出现的革命历史传记剧，拓开了长期以来的题材“禁区”。它敢于将一直神秘莫测的领袖人物当作描绘的对象，一一展示在观众的面前。同时，也敢于将老一代无产阶级革命家置于重大的历史事件中来描述，显现他们的革命家的宏伟气魄；还敢于小范围地将他们放置在日常生活和爱情领域，来塑描他们的平凡的人性。可以说，描写老一代无产阶级革命家的作品在新时期创作中占有突出的地位，并且对文学关于英雄形象的塑造提供了足资可鉴的经验。

注释：

[①] 《邓小平文选》第二卷（1975——1982），人民出版社 1983 年，第 133 页。

[②] 列宁：《悼念雅·米·斯维尔德洛夫》，《列宁全集》第 29 卷，人民出版社 1985 年，第 71 页。

[③] 李龙云：《我所知道的于是之》，中国青年出版社 2004 年，第 15 页。

[④] 沙叶新：《〈陈毅市长〉创作随想》，《文汇报》1980 年 8 月 1 日。

[⑤] 赵寻：《战士和诗人》，《白桦剧作选》，上海文艺出版社 1980 年。

[⑥] 曹禺：《闪闪发光的一出好戏——看〈陈毅出山〉》，《中国戏剧年鉴》1981 年卷，中国戏剧出版社 1981 年。

[⑦] 沙叶新：《写在〈陈毅市长〉发表的时候》，《剧本》1980 年第 5 期。

[⑧] 孟繁华：《1978：激情岁月》，山东教育出版社 1998 年，第 1 页。